

最低工资政策、成本不完全传递与 多产品加成率调整*

许明 李逸飞

内容提要: 本文探究了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对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的影响效应,尤其是:最低工资政策引致的成本不完全传递和多产品加成率差异化调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总体上,最低工资政策使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加成率相比未受影响企业降低了1.24%—1.70%。(2)在策略上,最低工资政策促使企业将一部分成本通过价格传递给消费者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提高了核心产品的价格、加成率和质量。(3)在福利上,最低工资政策提高了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总体上改善了多产品出口企业的福利,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劳动者与企业的“双赢”。本文的发现弥补了相关文献忽视多产品企业的典型事实和企业面对政策冲击的内部资源配置行为,有助于重新审视最低工资政策对出口企业行为的影响,对培育国内市场、提升出口企业竞争新优势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多产品企业 最低工资政策 产品加成率 成本不完全传递 资源配置

一、引言

长期以来,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助推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但在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已成为制约中国对外出口的重要因素(陆旻和蔡昉,2016)。现有研究大多发现,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虽然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中国劳动力价格偏低的问题,推动了企业劳动力成本和平均工资的增加,但加重了企业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产生了不利影响(Draca et al. 2011; Gan et al. 2016)。究其原因在于,部分相关文献建立在单一产品企业假设的基础上,不仅掩盖了多产品出口企业普遍存在的典型事实及其所产生的潜在贸易利得,而且忽略了企业内部产品的差异化调整和产品转换(Eckel & Neary 2010; Bernard et al. 2010)。虽然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导致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但由于成本—价格的传递性,企业可以将部分产品的价格和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并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用以抵消政策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将多产品出口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重新审视最低工资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

产品加成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一国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配中的收益,反映了企业对产品价格维持在边际成本之上的能力,能否保持较高的产品加成率是衡量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Edmond et al. 2015; De Loecker et al. 2016)。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对多产品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如何?可能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是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研究。本文发现,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影响了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行为,将产品成本通过

* 许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信箱:xmphd@cass.org.cn;李逸飞,管理世界杂志社,邮政编码:100026,电子信箱:liyfpd@ruc.edu.cn。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中国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与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研究”(16CJL014)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价格部分传递给消费者,提高核心产品的价格、加成率和质量,从而抵消政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优化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

本文的贡献可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内容上,深入探究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对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的影响效应。现有文献主要从两个角度研究最低工资与企业行为的关系,一是主要研究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例如 Gan et al. (2016)、赵瑞丽等(2018)等。由于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只对少部分企业产生影响,直接引入最低工资标准变量没有剔除不受影响的企业,实质上高估了最低工资政策产生的影响。二是基于企业层面研究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这类研究无法解释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行为,忽视了最低工资政策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本文将研究视角置于企业—产品层面,揭示最低工资政策对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优化行为,有助于重新理解最低工资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2)机制上,重点探讨了最低工资政策的成本不完全传递效应和多产品加成率差异化调整效应。通过验证成本传递的不完全性,合理解释为何最低工资政策降低了产品加成率,以及企业将成本通过价格传递给消费者,提高核心产品的价格、加成率和质量的内生逻辑。(3)政策上,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虽然总体上降低了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加成率,但这并不意味着福利的下降。本文检验了最低工资政策实施对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影响,将最低工资政策对企业的影响细化到产品层面,更好地揭示了最低工资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内部资源在核心和非核心产品之间的配置行为,指出最低工资政策引致企业内部资源向核心产品调整,促进核心产品加成率的提升,最终实现了劳动者和企业的“双赢”,即最低工资政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者收入,同时优化了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这一结论有助于重新审视最低工资政策实施和完善的重要性,有助于对如何提升多产品出口企业绩效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典型事实;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第六部分是影响机制检验;第七部分是进一步讨论,对最低工资政策实施的资源配置效应进行检验;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典型事实

(一) 文献回顾

1. 关于最低工资政策评估的相关研究

现有文献主要关注最低工资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直接影响,普遍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抑制了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从而影响就业情况(José et al. 2019)。部分文献关注了最低工资政策对人力资本、对外投资等方面的影响(孙楚仁等 2013; Gan et al. 2016; 刘行和赵晓阳 2019);还有部分文献在企业层面研究了最低工资的影响效应,认为企业不会将最低工资提高带来的成本上升完全转嫁给消费者,而是由企业自身承担大部分成本的上升(Lemos 2008)。尽管现有研究涉及了最低工资对企业生产率、利润率和价格的影响(赵瑞丽等 2018),例如 Draca et al. (2011) 基于英国数据分析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发现最低工资显著减少了企业利润,特别对于市场势力较高的行业,但尚缺乏来自产品层面的证据。企业产品加成率充分反映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定价能力,目前还没有关于最低工资政策与产品加成率的系统研究。

2. 评估政策冲击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

现有文献主要从出口退税调整(Tan et al. 2015)、关税削减(刘啟仁和黄建忠 2015; Lu & Yu, 2015; Fan et al. 2018a; 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9)、贸易配额取消(Upward & Wang 2016)等政策冲击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关于汇率对企业出口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汇率价格传递效应及其影响因素(Amiti et al. 2014)。以上文献大多基于单产品企业假设,但多产品出口企业在全世界出口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一部分文献开始关注政策冲击对多产品出口企业的影响(De Loecker et al. 2016;

祝树金等 2018) 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会带来多产品企业产品范围的扩大,以及销售额、价格和加成率的提高,且与核心产品距离越接近,提高幅度越大(Chatterjee et al. 2013)。

另外,一部分文献还关注了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Draca et al. 2011; Gan et al. 2016; 许和连和王海成 2016; 赵瑞丽等 2018),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不利于企业出口。这一结论是否意味着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将导致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会处于不利地位和降低出口企业绩效?而且上述结论也无法解释为何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如果仅仅对劳动者有利而牺牲企业利益,为何政府还一直强调适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些结论和现象在现有研究框架下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其原因在于,这一结论的得出主要集中于企业或产业层面,忽视了多产品企业的典型事实,无法观测到企业面对政策冲击影响时内部的策略变化和资源配置行为,从而高估最低工资政策对企业产生的消极影响。鉴于此,探究最低工资政策对出口企业绩效的研究亟待从产品视角重新考量。

(二) 典型事实

1. 制度背景

中国最低工资制度虽然起步较晚,但近些年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完善。以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为标志,中国正式确立了最低工资的法律地位,并开始尝试推行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制度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生活,使劳动者有尊严地从事工作,又不过多增加企业成本负担,不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此外,最低工资制度还有改善资本和劳动之间收入份额、调节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等积极意义。自2004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出台《最低工资规定》以来,中国调整最低工资力度加大,各地区全面推行了最低工资制度,要求至少每两年调整一次最低工资标准,并对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幅度不断加大。《最低工资规定》具有较强的执法力度,且规定了违反《最低工资规定》的惩罚措施。由于2004年的最低工资制度改革,最低工资的调整变得常态化。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的提出,从法律上要求企业必须一律强制实施最低工资政策,有效地提高了企业贯彻执行最低工资政策的力度。《最低工资规定》这一政策的实施显著影响了企业的行为。同时,这一政策的出台具有良好的外生性。一方面,2004年的《最低工资规定》由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是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该政策的出台并没有明显的预期(Gan et al. 2016; 蒋灵多和陆毅, 2017);另一方面,企业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并不能显著影响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因此,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素材。

2. 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的典型事实

多产品出口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普遍存在(钱学锋等 2013; 祝树金等 2018)。表1列示了2000—2013年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占全部出口企业的数量、产值和出口额的平均占比和产品数量。2000—2013年,多产品出口企业的数量、产值和出口额的平均占比分别为72.54%、80.79%和90.56%,总体呈上升趋势,这表明多产品出口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体地位。出口企业的产品数量也呈逐年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5.71个上升到2013年的8.97个,2000—2013年总体平均产品数量为7.95个,这表明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范围较大。

表1 多产品出口企业在全部出口企业中的占比情况及产品数量(2000—2013年)

年份	企业数量占比(%)	产值占比(%)	出口额占比(%)	产品数量(个)
2000	66.63	74.15	86.43	5.71
2001	67.53	75.92	87.63	5.75
2002	70.11	77.99	89.29	6.02
2003	70.90	79.60	89.12	6.25

续表 1

年份	企业数量占比(%)	产值占比(%)	出口额占比(%)	产品数量(个)
2004	70.88	80.81	89.48	6.03
2005	71.85	80.79	91.14	6.26
2006	71.16	79.83	89.19	6.16
2007	74.69	84.03	91.19	13.07
2008	75.27	84.06	91.14	11.04
2009	75.30	83.63	92.06	9.68
2010	73.34	83.69	92.31	8.31
2011	74.58	81.19	90.82	9.22
2012	76.50	82.11	93.60	8.77
2013	76.83	83.22	94.42	8.97
平均	72.54	80.79	90.56	7.95

注：产品数量为多产品出口企业每年 HS6 位码产品种类的平均数量。

多产品出口企业内产品的出口额分布是否均匀？每个企业是否有其出口的核心产品或重要产品？首先，在年份—企业组合内，根据出口额大小，对产品进行排序，得到排序变量 $Rank$ ， $Rank$ 等于 1 的产品为出口额最大的产品，这一产品也称为核心产品 (Eckel & Neary 2010)，其他产品则为非核心产品。图 1 (a) 绘制了 2000—2013 年多产品出口企业核心产品和非核心产品出口额占比情况。2000—2013 年期间核心产品和非核心产品出口额占比稳定，其中，核心产品出口额占比约为 75%，非核心产品出口额占比约为 25%。进一步根据产品排序变量 $Rank$ 的中位数将多产品企业的产品分为两部分，产品排序高于或者等于中位数的产品为外围产品，产品排序低于中位数的产品则为内围产品，内围产品代表企业的重要产品。采取相同的方法绘制了 2000—2013 年内围和外围产品出口额占比情况，见图 1 (b)。2000—2013 年内围产品出口额占比略有上升，在 95%—97% 之间浮动，所有外围产品出口额仅占出口总额的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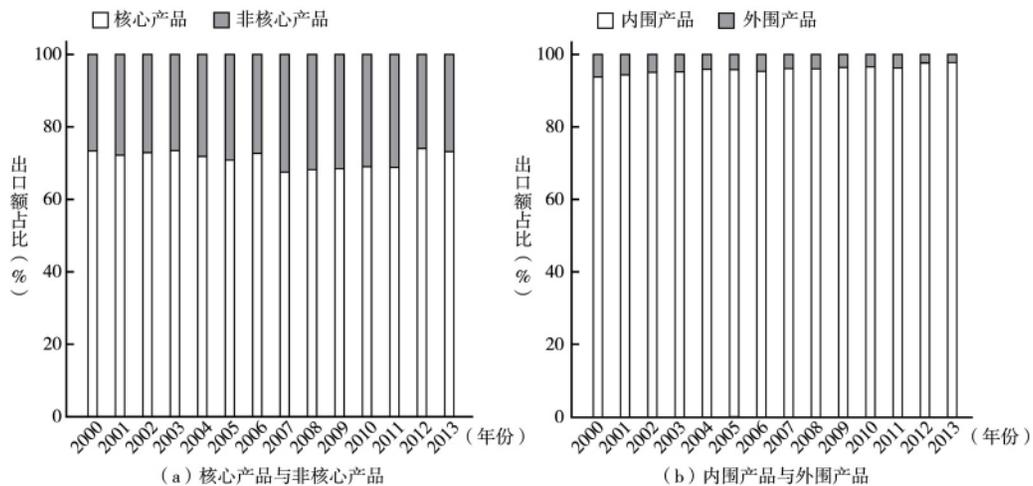


图 1 多产品出口企业内产品类型的出口额分布(2000—2013 年)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关于最低工资政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就业、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等方面的经济效应

(José et al. 2019; Harasztosi & Lindner 2019) 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政策提升了企业成本,降低了企业就业需求、出口量和利润。基于中国企业数据的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政策降低了企业出口和利润,提高了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孙楚仁等 2013; 陆瑶等 2017)。直接受到最低工资政策影响的企业数量较少,仅为 4.5%—6.6%(叶林祥等 2015)。部分研究指出,最低工资政策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受约束企业和不受约束企业产生影响,直接效应是提升受约束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间接效应来源于不受约束企业中劳动者在外部市场变动下议价能力的提升,即最低工资政策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提升各类企业平均工资水平(马双和甘犁 2014)。从价格视角的研究表明,虽然最低工资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成本,但企业基于市场竞争等因素不会将最低工资上升的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企业自身或者通过上下游产业链消化了大部分上升的成本,以维持市场份额。基于中国 2007—2011 年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每上升 10%,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引致产品价格上升分别为 0.02% 和 0.07%,总效应低于 0.1%(徐建炜等 2017)。最低工资政策的间接效应可能大于直接效应,而企业产品的成本传递效应相对较低。基于匈牙利企业样本的研究发现,整体上最低工资政策引致的成本上升约 80% 转嫁给消费者,但是存在广泛的行业异质性,可贸易部门相比不可贸易部门的成本转嫁程度相对更低,该类行业中最低工资政策的失业效应更为明显(Harasztosi & Lindner 2019)。由于最低工资政策引致企业无法将成本通过价格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导致加成率在静态情形下显著降低。上述是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针对企业—产品层面的证据较为鲜见,多产品企业受到政策冲击影响短期内不会进行产品线调整(Mayer et al. 2014),总体上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可能显著降低静态情形下企业的产品加成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 1: 最低工资政策静态情形下通过直接效应对受到最低工资约束的企业产生影响,通过间接效应对未受到最低工资约束企业产生影响,总体上提高企业的工资水平和增加了企业的成本,由于成本的不完全传递(incomplete pass-through) 效应使企业的产品加成率显著下降。

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多产品企业面临产品线调整,当企业受出口市场竞争影响时,倾向于通过减少产品数量,降低非核心、外围产品比重,提升核心内围产品比重,对冲市场竞争效应(Mayer et al. 2014)。在开放条件下,对市场竞争影响多产品企业的研究表明,通过聚焦于更高生产率的核心产品或者重要产品的生产,总体上可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企业内资源配置水平(Mayer et al. 2016)。除具有理论基础外,也有充分的经验证据支撑。基于比利时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产品层面的生产率在面临进口竞争时显著上升,微观层面上支持企业通过转向核心产品生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Eckel et al. 2015)。借鉴 Mayer et al. (2014) 的模型设定方法,假定多产品企业在核心产品升级上具有成本优势,当面临外部市场需求冲击时,企业在差异化行业内更倾向于通过核心产品升级提升质量,对冲市场竞争效应。多产品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时,企业的产品线具有不同的质量阶梯,通过对不同质量的进口中间品生产不同质量的产品,其核心产品表现为相对更高的质量和价格。在面临更强的市场竞争时,企业通过减少外围低质量产品出口扩展边际,提高内围高质量产品出口集约边际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在动态情形下,多产品企业通过产品线调整,实现产品升级和成本节约的正向加成率效应大于因成本不完全传递引致的负向加成率效应时,即可能存在正向的动态加成率效应,反之总体上动态加成率仍下降。最低工资政策动态情形下影响企业内部产品选择和创新决策,多产品企业在面临出口市场竞争(负向需求冲击)或者正向需求冲击情形下,均可能集中生产核心产品,存在显著的企业内产品线调整(Mayer et al. 2016)。由于核心产品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资源配置效应),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引致多产品企业倾向于采取扩大核心产品生产,产生动态的资源优化配置效应。根据以上论证,本文提出:

假说 2: 最低工资政策通过多产品加成率差异化调整效应影响多产品出口企业, 倒逼产品创新, 并通过提高核心产品、重要产品的加成率和质量, 强化产品定价权, 从而有效抵减最低工资政策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

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研究资源的有效配置, 关于资源配置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一直以来备受学术界关注。微观视角的早期研究主要根据要素边际产出和价格的相对关系对资源配置进行了刻画 (Hsieh & Klenow, 2009)。由于竞争性行业内企业间的竞争行为会使得高生产率企业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进而提升行业总体的生产率水平和降低行业总体的生产率离散度, 部分研究以生产率离散度作为刻画资源配置程度的代理变量 (Foster et al., 2016)。进一步的研究主要从企业定价行为出发, 认为偏向竞争性行业结构下的企业价格和成本偏离程度总体接近, 市场竞争的结果仍然是偏向于高生产率企业占领大部分市场, 从而降低了行业总体的加成率离散度, 因此, 相关实证研究也多使用行业内加成率分布的离散度作为评价资源配置程度的代理变量 (Lu & Yu, 2015)。目前, 由于测算方法和数据来源限制, 直接关于企业—产品层面加成率离散度的研究较为鲜见, 最低工资政策倾向于通过企业产品加成率进行调整, 增加高加成率的核心产品比重, 总体上降低企业内产品加成率离散度, 提升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基于此, 本文提出:

假说 3: 最低工资政策直接作用于产品加成率, 改变不同分位数上产品加成率分布, 提高核心产品和重要产品的加成率, 降低企业内产品加成率的离散程度, 优化企业内部资源配置, 最终实现劳动者和企业的“双赢”。

四、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借鉴 Draca et al. (2011) 的研究, 以 2004 年《最低工资规定》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 本文构建双重差分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模型研究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对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的影响, 模型设定如下:

$$\ln markup_{fgct} = \alpha + \beta Treat_f \times Post04_t + \mu X_{fgt} + \eta F_{ct} + \delta_{fg} + \delta_t + \varepsilon_{fgct} \quad (1)$$

其中 f, g, c 和 t 分别代表第 f 个企业、第 g 个产品、第 c 个城市和第 t 年。被解释变量 $\ln markup$ 代表产品加成率的对数, 构建企业—产品层面的三要素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根据 De Loecker et al. (2016) 的方法, 并借鉴 Fan et al. (2018a) 对要素分配系数进行调整, 基于出口量测度企业的产品加成率。 $Treat$ 用以识别最低工资政策影响的企业差异。根据 Draca et al. (2011), 若 2004 年企业所在城市的最低工资高于上一年企业平均工资, 则定义为受政策影响相对较大的组为处理组, 取值为 1; 否则为对照组, 取值为 0。 $Post04$ 用以识别最低工资政策的冲击时间, 由于《最低工资规定》自 200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蒋灵多和陆毅 (2017) 的设定方法, 将 2004 年取值为 5/6, 2004 年之后的年份取值为 1, 2004 年之前的年份取值为 0。

控制变量方面 X 表示一系列行业和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 企业年龄 (age); 企业规模 ($size$), 用企业从业人数表示; 企业生产率 (tfp) 根据杨汝岱 (2015), 用 OP 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示; 企业是否盈利 ($produm$), “是”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 资本集中度 (kl), 用企业资本与从业人数的比值衡量; 企业是否获得补贴收入 ($subdum$), “是”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 行业竞争程度 (HHI), 用四位码行业的赫芬达尔指数表示。

由于在样本时间段内, 其他改革可能对企业的行为产生影响, 本文进一步控制: ① 国有资本占比 ($stateshare$), 用以控制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② 最终品进口关税 ($tariffout$) 和中间品进口关税 ($tariffin$), 在 2004 年最低工资政策实施前后, “入世”对企业的出口行为具有较大影响, 尤其是中间

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更加显著(Yu 2015; Fan et al. 2018b)。^① 本文借鉴毛其淋和许家云(2019)的做法,计算中国HS6位码产品层面的最终品进口关税和中间品进口关税,用以控制贸易自由化产生的影响。

《最低工资规定》要求“不同省份均可以有不同的地区标准”,也会考虑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标准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行为活动。为了降低最低工资调整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根据Fan et al.(2018b)的设定,本文进一步控制城市人均GDP对数($pergdp$)、城市总人口对数(pop)和城市人均工资对数($perwage$)等可能影响最低工资调整的地区特征变量(F)。同时,还控制了企业—产品固定效应(δ_{fg})、年份固定效应(δ_t)、 ε_{fgct} 为随机扰动项。

(二)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四个部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全国地级市月最低工资数据。第一套是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根据杨汝岱(2015)的做法,对行业代码、价格指数进行调整,经统计,1998—2013年共包含4350179个观测值。第二套是2000—2013年海关数据库,包含企业—产品—市场层面的相关信息,样本期内共计25777722个观测值。第三套是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包含287个城市有关财政、人口、生产等方面的相关信息。第四套是1998—2013年地级市的月度最低工资数据,主要通过浏览各省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网站和查阅包含最低工资信息的地方政府网站获得,由于拉萨市和重庆市相关数据缺失,最终得到285个地级市的最低工资数据。由于《最低工资规定》自2004年开始执行,本文主要使用2000—2006年四套数据的匹配数据。

剔除单产品出口企业样本后,本文根据黄先海等(2016)对样本进行数据处理,主要包括:删除了从业人数小于8、固定资产总值小于固定资产净值、非制造业行业等异常值样本;删除固定资产折旧、营业收入等指标缺失的样本;为剔除企业业绩较差或兼并重组等影响,剔除营业利润率绝对值大于1或资产负债率大于1或小于0的样本。此外,对关键指标在第1%、99%分位进行Winsorize处理,并对涉及的变量均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了平减处理。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最低工资政策实施对产品加成率的影响

表2列示了双重差分模型(1)的估计结果。表2第(1)、(2)列采用了逐步增加企业层面、行业层面控制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第(3)列考虑到了中国加入WTO带来的贸易自由化影响,同时控制了最终品进口关税和中间品进口关税。第(1)—(3)列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企业—产品固定效应。第(4)列在第(3)列基础上,加入了城市特征变量以降低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并利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第(5)列为控制了所有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以减少遗漏变量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关心的是 $Treat \times Post04$ 对应的系数方向及大小。

从表2回归结果来看, $Treat \times Post04$ 对应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相对对照组而言,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处理组企业的产品加成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2004年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使得处理组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相对对照组而言,降低了1.24%—1.70%,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1。最低工资政策对企业的直接影响是企业被动接受参照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平均生活费用、普遍工资水平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一定程度增加了用工成本。面对成本的上升,由于可能存在成本的不完全传递,使企业不会将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而是通过适度调整产品定价由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分摊,进而导致产品加成率总体下降。从主要的控制变量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有利于提高企业

^① 感谢审稿人指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重要性。

将技术转化为生产产品的能力，最终促进了产品加成率的提高。从表2第(5)列回归结果来看，最终品进口关税对应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贸易自由化显著促进了企业产品加成率的提升。

表2 最低工资政策实施对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的影响

变量	lnmarkup				
	(1)	(2)	(3)	(4)	(5)
<i>Treat × Post04</i>	-0.0156 ** (-2.4846)	-0.0133 ** (-2.1304)	-0.0135 ** (-2.1715)	-0.0170 *** (-3.4809)	-0.0124 ** (-2.0001)
<i>lnsize</i>	-0.1559 *** (-68.7355)	-0.1798 *** (-73.2882)	-0.1800 *** (-73.0841)	-0.3432 *** (-4.0e+02)	-0.1793 *** (-72.7781)
<i>lnage</i>	-0.0165 *** (-5.8749)	-0.0082 *** (-2.9667)	-0.0093 *** (-3.3511)	0.0182 *** (17.1532)	-0.0091 *** (-3.2939)
<i>tfp</i>	0.5721 *** (41.0639)	0.5852 *** (41.3269)	0.5829 *** (41.1831)	1.7996 *** (92.0910)	0.5793 *** (40.9064)
<i>lnkl</i>		-0.0441 *** (-34.5845)	-0.0440 *** (-34.4714)	-0.1233 *** (-2.0e+02)	-0.0433 *** (-33.9148)
<i>subdum</i>		-0.0211 *** (-12.3475)	-0.0210 *** (-12.3193)	-0.0481 *** (-27.9997)	-0.0216 *** (-12.6016)
<i>produm</i>		-0.0466 *** (-31.0501)	-0.0467 *** (-31.2064)	-0.1248 *** (-81.2253)	-0.0475 *** (-31.6850)
<i>stateshare</i>		0.0521 *** (4.6832)	0.0501 *** (4.5155)	0.2804 *** (39.8303)	0.0478 *** (4.3438)
<i>HHI</i>		0.0119 (0.3081)	0.0062 (0.1607)	-1.8346 *** (-50.1382)	0.0067 (0.1754)
<i>tariffin</i>			0.1006 (1.2714)	0.0779* (1.6909)	0.0790 (0.9989)
<i>tariffout</i>			-0.7772 *** (-12.0218)	0.1004 *** (3.5381)	-0.7627 *** (-11.8086)
<i>pergdp</i>				-0.0446 *** (-29.2760)	-0.0079 *** (-5.0601)
<i>perwage</i>				0.1215 *** (31.0393)	-0.0707 *** (-8.1574)
<i>pop</i>				-0.0483 *** (-37.1506)	0.0241 *** (8.2926)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否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否	是
N	648992	648992	648992	647367	647367
adj R ²	0.889	0.890	0.890	0.458	0.890

注：*、**、*** 分别表示 10%、5% 和 1% 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回归系数的标准误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下表同。

(二) DID 前提假设检验

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对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的影响，但是

双重差分方法的使用需要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即检验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趋势应是平行的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为此,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对平行趋势进行检验:

$$\ln markup_{fgct} = \alpha + \beta Year_t \times Treat_f \times per04_t + \mu X_{fgct} + \eta F_{ct} + \delta_{fg} + \delta_t + \varepsilon_{fgct} \quad (2)$$

其中, $Year_t$ 为年份虚拟变量,2004年之前年份的 $per04$ 取值为1,否则为0。其他变量设定同计量模型(1)。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表明,2004年以前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对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产品加成率影响并不显著,并不存在随年份变动的差异性影响,即双重差分模型满足平行趋势检验。进一步地,2004年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是否具有随机性,也是双重差分模型成立的一个重要条件。根据 Draca et al. (2011),本文对2004年前的年份分别设置为最低工资政策实施年份,进行相应的安慰剂检验(placebo test),若回归系数显著,则表明最低工资政策实施前存在预期效应。安慰剂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设定2001年为政策调整年份($Treat \times Post01$),还是设定2002年($Treat \times Post02$)或2003年($Treat \times Post03$)作为政策实施年份,其对应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2004年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对企业而言并不存在明显的预期效应。

(三)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指标和样本处理

具体包括:(1)替换被解释变量。根据 De Loecker et al. (2016),基于平减后的出口额作为产出额重新计算产品加成率。(2)将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时间变量 $Post04$ 由5/6替换为1。(3)改变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时间,将2005年以后的年份取值为1,其他为0。(4)只保留2004年之前的年份,考察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5)分别剔除企业平均工资高于75%分位、50%分位以上的样本和低于25%分位的样本。上述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得到的结论与基准回归均一致,表明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总体上不利于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的提升。

2. 改变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刻画2004年最低工资政策强制实施前后对企业多产品加成率的影响及变化,参照 Mayneris et al. (2018)重新设定计量模型(3);考虑连续变量最低工资标准对数($\ln mw$)的影响,设定计量模型(4),具体设定如下:

$$\ln markup_{fgct} = \alpha + \beta_1 \ln mw_{ct} \times per04 + \beta_2 \ln mw_{ct} \times Post04 + \mu X_{fgct} + \eta F_{ct} + \delta_{fg} + \delta_t + \varepsilon_{fgct} \quad (3)$$

$$\ln markup_{fgct} = \alpha + \beta \ln mw_{ct} + \mu X_{fgct} + \eta F_{ct} + \delta_{fg} + \delta_t + \varepsilon_{fgct} \quad (4)$$

改变计量模型设定的回归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导致最低工资对产品加成率的影响从系数上在2004年前后显著增强,与王欢欢等(2019)的研究发现相一致。将解释变量 $Treat \times Post04$ 直接替换为连续变量最低工资的对数($\ln mw$),结果仍然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降低了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加成率。

(四) 异质性检验

基准检验主要考察的是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对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的平均影响效应,掩盖了不同企业特征可能带来的差异性影响。接下来,进一步考察不同企业类型可能产生的回归结果差异。一是根据出口商品贸易方式进行划分。根据 Yu (2015),将企业按照出口商品贸易方式划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既从事加工贸易,又从事一般贸易)三种类型。加工贸易一直是中国开放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形式,近年来虽然比重有所下降,但是2019年所占比重仍然达到25.2%^①。根据本文的统计,样本期内加工贸易占比达到

^① 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http://www.customs.gov.cn>)公布的数据经过计算得到。

46.45% ,混合贸易占比 40.71% ,而一般贸易占比只有 12.84% 。二是根据所有权性质进行划分。本文根据实收资本类型占比的最终大小确定所有权性质 ,最终划分为国有、民营、外资和中国港澳台三种类型。^①

按出口商品贸易方式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 ,对于加工贸易企业 , $Treat \times Post04$ 对应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这表明相比如对照组而言 ,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的产品加成率;对于一般贸易企业 , $Treat \times Post04$ 对应的系数与加工贸易截然相反 ,相比如对照组而言 ,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一般贸易企业的产品加成率;对于混合贸易企业 , $Treat \times Post04$ 对应的系数在 10% 水平下显著 ,方向依然为正。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出口导向战略使大量低效率企业从事出口行为 ,加工贸易广泛存在。现有文献发现 ,加工贸易对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较大影响 ,是造成中国“出口低生产率之谜”的重要原因(许明和李逸飞,2018)。根据 Melitz & Ottaviano (2008) ,出口企业相比非出口企业通常具有更高的生产率 ,在选择效应的作用下 ,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加成率。加工贸易企业由于对进口料件(或来料)进行加工或者装配 ,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居多 ,普遍具有较低的生产率。最低工资政策的强制实施 ,显然提高了这类企业的生产成本 ,进一步降低了产品加成率水平。而一般贸易企业由于生产率相对较高 ,通常具有资本或者技术比较优势 ,在全球价值链的嵌入位置相对较高 ,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反而更加直接倒逼这类企业创新 ,提升产品质量和促进产品加成率的差异化调整。对于混合贸易而言 ,企业可以通过调整核心产品和非核心产品的劳动力成本进而抵消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 ,总体上对应系数仍然显著为正。按所有权性质分类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 ,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对国有企业、外资和中国港澳台企业的影响显著为负 ,其中 ,对国有企业的影响程度最大。虽然劳动力成本对民营企业的业绩会有较大影响 ,但是由于民营企业在人事雇佣、生产等方面相对灵活 ,且参与出口的企业生产率普遍较高 ,因此抵消了一部分最低工资政策实施的不利影响 ,影响并不显著。

六、影响机制检验

(一) 最低工资政策实施引致的成本不完全传递效应

由于产品加成率同时包含了产品的价格和边际成本信息 ,使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可能通过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对产品加成率产生影响(许明和李逸飞,2018)。本文首先检验最低工资政策实施引致的成本不完全传递效应。由于成本传递的不完全性 ,导致最低工资政策实施引致的成本上升可以通过价格传递给消费者 ,虽然抵消了一部分最低工资政策对企业的消极影响 ,但是总体上仍然降低了产品加成率水平。根据 Lu & Yu (2015) ,由海关数据计算得到出口产品的价格 ($price$) ,再利用出口产品价格减去产品加成率从而得到产品对应的边际成本 (mc)。表 3 列示了最低工资政策实施影响企业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 ,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均提高了产品的价格和边际成本 ,但是相比如对照组而言 ,最低工资政策在 5% 显著水平下提高了处理组出口产品的边际成本 ,而对产品价格的影响不显著 ,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可以通过提高核心产品价格、降低非核心产品价格的方式抵消劳动成本上涨的影响 ,导致这一冲击对产品价格总体上不产生显著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检验最低工资政策引致的不完全成本传递效应。根据 De Leocker et al. (2016) ,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ln price_{jgt} = \kappa_{jg} + \zeta \ln mc_{jgt} + \varepsilon_{jgt} \quad (5)$$

^① 由于外资企业可以享受各种税收优惠 ,导致企业通过填报“登记注册号”来改变企业类型 ,这将导致依靠“登记注册号”来识别所有权类别的做法失效 ,因此 ,根据实收资本比例来确定企业所有权更加准确。

表 3 最低工资政策实施对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lnprice	lnprice	lnmc	lnmc
<i>Treat × Post04</i>	0.0179 (1.5569)	0.0168 (1.4608)	0.0300** (2.5481)	0.0292** (2.4773)
是否包含关税	否	是	否	是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647367	647367	647367	647367
adj R ²	0.940	0.940	0.942	0.942

注:限于篇幅,未列示控制变量结果,下表同。

其中 κ_{jg} 是企业—产品固定效应,用以衡量企业—产品不随时间变化的平均加成率水平; ζ 表示产品的成本—价格传递系数,若其介于 0—1 之间,即存在成本不完全传递性;若 $\zeta = 0$,则价格完全等于企业—产品固定效应;若 $\zeta = 1$,则代表成本完全传递到价格。由于边际成本的测算存在一定的偏误问题,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分别选取原材料作为工具变量、工资作为工具变量,以及原材料、工资和中间品关税共同作为工具变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计量模型(5)进行估计,并与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结果进行比较,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表 4 第(1)列列示了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第(2)—(4)列列示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无论采用哪种估计方法,产品的成本—价格传递系数均位于 0—1 之间,且在 1% 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相较于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系数(0.8655),在控制内生性后估计的系数显著下降,但均表明存在不完全的成本传递效应,其政策含义是,当最低工资政策提高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后,企业提高核心产品的价格,将一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抵消这一冲击带来的消极影响,但是却一定程度上仍降低了产品的加成率水平,进一步验证了假说 1。

表 4 最低工资政策实施引致的成本不完全传递效应检验

	(1)	(2)	(3)	(4)
	OLS	2SLS	2SLS	2SLS
工具变量		原材料	工资	工资、原材料和中间品关税
lnmc	0.8655*** (331.6757)	0.0670*** (12.0410)	0.1254*** (4.9239)	0.0673*** (12.108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647367	459366	459366	459366
adj R ²	0.985	0.122	0.211	0.122
Kleibergen-Paap rk LM $\chi^2(1)$ statistic		4.2e+04	1798.920	4.2e+04
Weak Instrument (F statistic)		3.1e+04	1227.257	1.6e+04

注:第(2)—(4)列报告了检验工具变量的识别不足(Kleibergen-Paap rk LM $\chi^2(1)$ statistic)和弱识别(Weak Instrument (F statistic))的统计量,均显著拒绝了识别不足和弱识别的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有效。

(二) 最低工资政策实施引致的多产品加成率差异化调整效应

最低工资政策实施对多产品出口企业直接的作用结果是导致产品总体的加成率下降。对于多产品出口企业,可以在成本提高的前提下,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重要产品或者核心产品的生产上,刺激企业进行产品的优化和创新,倒逼企业提高核心产品的加成率水平,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减少政策冲击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为检验最低工资政策实施引致的多产品加成率差异化调整效应,本文构建两类指标对企业产品的差异化进行衡量:一是构建产品排序变量(*rank*),其定义为多产品出口企业内按照产品出口额大小进行排序,若*rank*值越小,表示这一产品距离核心产品更近,对企业而言更加重要。二是构建非核心产品的虚拟变量(*uncore*)。若产品排序变量*rank*>1,则取值为1;否则为0。

表5第(1)列和第(2)列列示了反映最低工资政策对多产品加成率差异化调整效应的回归结果。本文发现,产品排序对数(*lnrank*)越大,则越不利于产品加成率的提高,这意味着产品越重要,则越有利于产品加成率的提升。从最低工资政策与产品排序变量的三重差分(*Treat* × *Post04* × *lnrank*)结果来看,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更有利于企业内部的重要产品加成率的提升,因此验证了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存在加成率的差异化调整效应。表5第(2)列列示了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对核心产品加成率的影响,与对重要产品的差异化调整过程类似,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使得核心产品的加成率提升,且核心产品的加成率更大。由于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可能激励企业对产品进行质量升级以应对外部的政策冲击,通过产品质量升级促进核心产品加成率的提升。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机制进行检验。本文将解释变量由产品加成率对数(*lnmarkup*)替换为产品质量对数(*lnquality*)。根据Khandelwal et al. (2013)对产品质量进行计算,选取需求价格弹性系数选取需求价格弹性系数 $\sigma = 5$ 。表5第(3)列和第(4)列列示了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对企业重要产品质量调整的影响效应。从最低工资政策与产品排序的三重差分对应的回归系数来看,其显著为负,这表明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使离核心(重要)产品更接近的产品的质量提升更多。因此,在企业资源一定的前提下,最低工资政策的冲击使企业将内部资源更倾向核心产品或重要产品,促进核心产品或重要产品的质量提升,假说2得到验证。

表5 最低工资政策实施引致的多产品加成率差异化调整效应

变量	(1)	(2)	(3)	(4)
	<i>lnmarkup</i>	<i>lnmarkup</i>	<i>lnquality</i>	<i>lnquality</i>
<i>Treat</i> × <i>Post04</i> × <i>lnrank</i>	-0.0026** (-2.5029)		-0.0028* (-1.7266)	
<i>Treat</i> × <i>Post04</i> × <i>uncore</i>		-0.0050** (-2.4227)		-0.0096*** (-3.0658)
<i>Treat</i> × <i>Post04</i>	-0.0157* (-1.6940)	-0.0090* (-1.8173)	0.0031 (1.3347)	0.0071*** (2.7575)
<i>lnrank</i>	-0.0284*** (-21.9059)		-0.0567*** (-1.4e+02)	
<i>uncore</i>		-0.0304*** (-13.4120)		-0.0423*** (-69.1727)
企业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续表 5

变量	(1)	(2)	(3)	(4)
	lnmarkup	lnmarkup	lnquality	lnquality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647367	647367	561526	561526
adj R ²	0.891	0.890	0.852	0.835

七、进一步讨论: 最低工资政策实施的资源配置效应

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虽然一定程度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但却并不利于出口企业的竞争力提升,尤其是近年来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提高,无疑会对企业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这一政策的实施到底对企业而言是否合理?本文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由于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对产品加成率的影响差异反映了其对内部资源配置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便转换为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是否改善了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本文通过考察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对企业内部产品加成率分布离散度的影响,以判断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是否改善了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dispmkp_{fct} = \beta + \beta_0 Treat_f \times Post04_t + \beta_1 X_{ft} + \beta_2 F_{ct} + \delta_f + \delta_t + \varepsilon_{fct} \quad (6)$$

其中 $dispmkp$ 代表企业内部的产品加成率分布离散度。本文选取 4 个指标作为企业内部的产品加成率分布离散度的衡量指标,具体包括:①企业内产品加成率标准差($sdkp$)。根据 Hsieh & Klenow(2009),加成率的离散程度是反映资源错配程度的重要指标。②企业内产品加成率变异系数($cvmkp$)。用企业内产品加成率的标准差与其均值的比值表示。③企业内产品加成率的基尼系数($ginimkp$)。④企业内产品加成率的泰尔指数($theilmkp$)。由于基尼系数过强的期望性质和不易分解性,因此,本文进一步使用泰尔指数,企业内产品加成率的泰尔指数定义为:

$$theilmkp_{ft} = \frac{1}{n_{fgt}} \sum_{g=1}^{n_{fgt}} \frac{markup_{fgt}}{markup_{ft}} \log \left(\frac{markup_{fgt}}{markup_{ft}} \right) \quad (7)$$

其中 $markup_{fgt}$ 表示第 t 年企业 f 对应的 g 产品的加成率。 $markup_{ft}$ 代表第 t 年企业 f 内产品加成率的均值,其他变量定义同(1)式。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最低工资政策实施与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分布离散度

变量	(1)	(2)	(3)	(4)
	$sdkp$	$cvmkp$	$ginimkp$	$theilmkp$
$Treat \times Post04$	-0.0053 ** (-2.2714)	-0.0099 *** (-3.8503)	-0.0030 *** (-2.8366)	-0.0026 *** (-4.0902)
企业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603558	595744	647367	647367
adj R ²	0.618	0.763	0.791	0.704

根据表 6 回归结果,企业产品加成率分布离散度对应的代理变量均显著为负,表明相比对照组,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降低了处理组企业内产品加成率分布的离散程度,降低了企业内部的资源错配程度,总体上有利于多产品出口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因此,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虽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产品加成率,但是却促使企业通过技术调整、产品升级、促进产品进入退出等路径提高了核心产品的加成率,从而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正是因为最低工资政策对企业存在这种“倒逼”机制,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但是从福利的角度证明了其合理性,真正实现了劳动者和企业的“双赢”,即最低工资政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者收入,保障劳动者权益,又优化了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结合相关文献和上文的回归结果,最低工资政策还可能直接作用于产品加成率,改变不同分位数上产品加成率的分布,从而降低了企业内产品加成率的离散程度。为进一步研究最低工资政策对企业内产品加成率分布离散度的影响机制,考察企业内不同分位数产品加成率受最低工资政策冲击的影响差异,本文进一步生成产品加成率均值($meanm_{kp}$)和 5% ($p5m_{kp}$)、25% ($p25m_{kp}$)、50% ($p50m_{kp}$)、75% ($p75m_{kp}$) 以及 95% ($p95m_{kp}$) 分位的产品加成率,并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由表 7 的第 (1) — (6) 列可知,最低工资政策主要降低了最低分位和最高分位产品加成率,其中 5% 分位对应的回归系数为 -0.0105 , 95% 分位对应的回归系数为 -0.0209 ,但平均值对应的系数只有 -0.0087 ,其他分位并不显著,这表明最低工资政策导致两端分位(5%、95%)产品加成率的降低幅度大于中间分位加成率的降低幅度,总体上降低了企业内产品加成率分布的离散度,从而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表 6 和表 7 的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说 3。

表 7 最低工资政策对不同分位企业产品加成率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5)	(6)
	$meanm_{kp}$	$p5m_{kp}$	$p25m_{kp}$	$p50m_{kp}$	$p75m_{kp}$	$p95m_{kp}$
$Treat \times Post04$	-0.0087^{**} (-2.0319)	-0.0105^{**} (-2.1851)	-0.0053 (-1.1389)	-0.0062 (-1.4000)	-0.0058 (-1.2577)	-0.0209^{***} (-3.7084)
企业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647367	647367	647367	647367	647367	647367
adj R ²	0.844	0.843	0.844	0.842	0.807	0.671

八、结论与政策建议

最低工资政策的相关法律建立、实施和完善对多产品出口企业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现有研究普遍发现,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通过成本效应降低了出口企业的绩效,这主要由于仅仅把企业看作一个单产品的“黑匣子”,忽视了企业面对最低工资政策冲击在企业内部所引致的资源配置行为,导致部分文献对最低工资政策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评估过于“片面”。本文发现: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总体上降低了多出口产品企业的产品加成率,但从企业内部来看,一方面,企业可以将成本通过价格部分传递给消费者,抵消政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企业内部资源在核心和非核心产品之间配置,最低工资政策使企业内部资源向核心产品调整,促进核心产品加成率提高和产品质量改善。本文进一步发现,最低工资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加成率,但却优化了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总体上改善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真正实现了劳动者

和企业的“双赢”。本文的发现弥补了部分文献忽视多产品企业典型事实的问题,验证了最低工资政策冲击下多产品出口企业内产品结构优化和质量的倒逼式升级机制,从产品层面重新审视最低工资政策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建议:第一,要适当控制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速,进行地区差异化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每年的增速不宜调整过快,应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生活费用、消费价格指数、个人缴纳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住房价格等情况。同时,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也要因地制宜。总体上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一般延长至三年,而对于北京、上海、深圳等房价较高的城市,尽量做到一年调整一次。第二,政府要进一步贯彻落实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和完善。最低工资政策虽然提高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但是却对企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助推作用,促进了企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升。政府在完善最低工资的相关法律法规时,应当进行充分的权衡,通过贯彻落实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在保障企业员工权益的基础上,建立劳资之间“合作共赢”的契约关系,从而更好地实现制度在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切实发挥作用。第三,政府积极落实对相关出口企业的减税降费,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最低工资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但一定程度上也给企业增加了负担。因此,政府一方面要重点促进企业降成本,积极落实减税、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下调用电价格等举措,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有力支持企业发展;另一方面,要重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担保,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第四,出口企业要积极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质量升级。为应对最低工资政策可能对企业带来的消极影响,企业不应被动接受,必须采取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一是重视自身核心产品的开发和销售。核心产品是企业利润增长的关键,在保障核心产品质量提高的基础上,注意核心产品的升级换代和技术改造,以适应市场竞争。二是加大对企业研发的投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复杂度,促进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三是根据不同的情境,对企业内部产品进行适当调整,以灵活应对市场需求变化。四是促进加工贸易由制造环节逐步向设计、研发、检测维修等新业态新模式转换,促进加工贸易企业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 黄先海、诸竹君、宋学印 2016 《中国中间品进口企业“低加成率之谜”》,《管理世界》第7期。
- 蒋灵多、陆毅 2017 《最低工资标准能否抑制僵尸企业的形成》,《中国工业经济》第11期。
- 刘行、赵晓阳 2019 《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是否会加剧企业避税》,《经济研究》第10期。
- 刘啟仁、黄建忠 2015 《异质出口倾向、学习效应与“低加成率陷阱”》,《经济研究》第12期。
- 陆暘、蔡昉 2016 《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基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模型》,《世界经济》第1期。
- 陆瑶、施新政、刘璐瑶 2017 《劳动力保护与盈余管理——基于最低工资政策变动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3期。
- 马双、甘犁 2014 《最低工资对企业在职培训的影响分析》,《经济学(季刊)》第1期。
- 毛其淋、许家云 2019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世界经济》第1期。
- 钱学锋、王胜、陈勇兵 2013 《中国的多产品出口企业及其产品范围:事实与解释》,《管理世界》第1期。
- 孙楚仁、田国强、章韬 2013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经济研究》第2期。
- 王欢欢、樊海潮、唐立鑫 2019 《最低工资、法律制度变化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世界》第11期。
- 徐建炜、邹静娴、毛捷 2017 《提高最低工资会拉升产品价格吗》,《管理世界》第1期。
- 许和连、王海成 2016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世界经济》第7期。
- 许明、李逸飞 2018 《中国出口低加成率之谜:竞争效应还是选择效应》,《世界经济》第8期。
- 杨汝岱 2015 《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经济研究》第2期。
- 叶林祥、T. H. Gindling、李实、熊亮 2015 《中国企业对最低工资政策的遵守——基于中国六省市企业与员工匹配数据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第6期。
- 赵瑞丽、孙楚仁、陈勇兵 2018 《最低工资与企业价格加成》,《世界经济》第2期。
- 祝树金、钟腾龙、李仁宇 2018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加成率》,《中国工业经济》第1期。

- Amiti, M., O. Itskhoki, and J. Konings, 2014, "Importers, Exporters, and Exchange Rate Disconnec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7), 1942—1978.
- Bernard, A. B., J. R. Stephen, and P. K. Schott, 2010, "Multiple-product Firms and Product Switch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1), 70—97.
- Chatterjee, A., R. D. Carneiro, and J. Vichyanond, 2013, "Multi-product Firms and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5(2), 77—110.
- De Loecker, J., P. K. Goldberg, A. K. Khandelwal, and N. Pavcnik, 2016, "Prices, Markups, and Trade Reform", *Econometrica*, 84(2), 445—510.
- Draca, M., S. Machin, and J. Van Reenen, 2011, "Minimum Wages and Firm Profita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3(1), 129—151.
- Eckel, C., and J. P. Neary, 2010, "Multi-product Firms and Flexible Manufactur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7(1), 188—217.
- Eckel, C., L. Iacovone, B. Javorcik, and J. P. Neary, 2015, "Multi-product Firms at Home and Away: Cost-versus Quality-based Compet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5(2), 216—232.
- Edmond, C., V. Midrigan, and D. Y. Xu, 2015, "Competition, Markups, and the Gains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10), 3183—3221.
- Fan, H., F. Lin, and L. Tang, 2018b, "Minimum Wage and Outward FDI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 135, 1—19.
- Fan, H., X. Gao, A. L. Yao, and L. A. Tuan, 2018a,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Markups: Micro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6(1), 103—130.
- Foster, L., C. Grim, J. Haltiwanger, and Z. Wolf, 2016, "Firm-level Dispersion in Productivity: Is the Devil in the Detai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5), 95—98.
- Gan, L., M. A. Hernandez, and S. Ma, 2016, "The Higher Costs of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Minimum Wages and Firms' Export Behavi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0, 81—94.
- Haraszosi, P., and A. Lindner, 2019, "Who Pays for the Minimum Wa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8), 2693—2727.
- Hsieh, C. T., and P. J. Klenow, 2009,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4), 1403—1448.
- José, A., E. Huet-Vaughn, I. Marinescu, B. Taska, and T. von Wachter, 2019, "Minimum Wage Employment Effects and Labor Market Concentr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101.
- Khandelwal, A. K., P. K. Schott, and S. J. Wei, 2013,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mbedded Institutional Reform: Evidence from Chinese Export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169—2195.
- Lemos, S., 2008, "A Survey of the Effects of the Minimum Wage on Price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2(1), 187—212.
- Lu, Y., and L. Yu, 2015,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Markup Dispers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7(4), 221—253.
- Mayer, T., M. J. Melitz, and G. I. P. Ottaviano, 2016, "Product Mix and Firm Productivity Responses to Trade Competi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2433.
- Mayer, T., M. J. Melitz, and G. I. P. Ottaviano, 2014, "Market Size, Competition, and the Product Mix of Export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2), 495—536.
- Maynerisy, F., S. Poncet, and T. Zhang, 2018, "Improving or Disappearing Firm-level Adjustments to Minimum Wages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 135, 20—42.
- Melitz, M. J., and G. I. P. Ottaviano, 2008, "Market Size, Trade, and Productiv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5(1), 295—316.
- Tan, Y., J. Han, and Y. Q. Ma, 2015, "Multiproduct Firms, Product Scope and the Policy of Export Tax Rebate", *China Economic Review*, 35, 33—46.
- Upward, R., and Z. Wang, 2016, "Quota Restrictions and Intra-firm Re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Exports to U. S.", *Economics Letters*, 144, 71—74.
- Yu, M., 2015, "Processing Trade, Tariff Reductions and Firm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Economic Journal*, 125(585), 943—988.

Minimum Wage Policy , Cost-incomplete Pass-through and Adjustment of Multi-product Markups

XU Ming^a and LI Yifei^b

(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ASS; b: Management World)

Summary: Previous studies show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minimum wage policy not only compromises the performance of export enterprises but also inhibits their potential positive roles. However ,these studies are generally based on studies of single-product enterprises that are regarded as “black boxes ,” and they neglect the optimization of product allocation within multi-product enterprises under a minimum wage policy. Taking multi-product export enterpri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a minimum wage policy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cultivate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multi-product export enterprises.

Based on a sample of matching data drawn from databases of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Chinese customs databas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minimum wage policy on the product markups of multi-product export enterprises. It focuses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cost-incomplete pass-through effects caused by the minimum wage policy and the differential adjustment of the product markup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In general ,compared with enterpri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minimum wage policy generally reduces the product markups of enterpris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by 1. 24% - 1. 70%. (2) Strategically ,to offset the possibl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minimum wage policy on product markup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enterprises can differentiate their products from their competitors and upgrade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s ,so as to increase markups of their core products and improve the product quality. (3) In terms of welfare ,the minimum wage policy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 welfare of multi-product export enterprises ,thus creating a win-win situation for workers and enterprises.

Some policy insights can be drawn from the above conclusions. First ,we need to appropriately control the growth rate of minimum wage standards and make differentiated adjustm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Seco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minimum wage policy. Third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tively implement tax cuts and fee reductions for export enterprises to fully promote their vitality. Fourth ,export enterprises should actively carry out technical improvements and product upgrades and adjustments.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1) This study primarily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minimum wage policy on the product markups of multi-product export enterprises. We shed light on the effects of this policy at the enterprise-product level ,revealing that the minimum wage policy optimizes enterprises' internal resource allocation ,which helps to clarify the impact of the minimum wage policy on the export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2) In terms of mechanism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st-incomplete pass-through effects of the minimum wage policy and the differential adjustment effects of the product markups. The results validate the cost-incomplete pass-through effects and reasonably explain why the minimum wage policy reduces product markups. They also reveal the internal logic that companies pass costs to consumers by increasing the prices ,markups ,and quality of core products. (3) In terms of policy-making ,although the minimum wage policy generally reduces the markups of multi-product export enterprises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cause the enterprise's welfare to declin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a minimum wage policy on resource allocation within multi-product export enterprises and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minimum wage on the enterprise's markups at the product level ,thus revealing how the minimum wage policy affects the allocation of internal resources between core and non-core products. It finds that the minimum wage policy drives enterprises' resources toward core products and increases the markups of core products ,thus contributing to a win-win situation for workers and enterprises.

Keywords: Multi-product Enterprise; Minimum Wage Policy; Product Markups; Cost-incomplete Pass-through; Resource Alloc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D21 , D63 , E24

(责任编辑:倪红福)(校对:南山)